

20

顾问 廖盖隆

世纪的中国

9

河南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的征程

王鸿模 苏品端◎著



D62
W204



顾问 岑益隆

20

世纪的中国

⑨

河南人民出版社

改革开放的征程

王鸿模 苏品端◎著

7874

D62

W2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开放的征程/王鸿模,苏品端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3(2004.1重印)
(20世纪的中国)
ISBN 7-215-00607-7

I. 改… II. ①王…②苏… III. 社会发展-中国
-1976~1989 IV. D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88730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A5 印张 16.875

字数 370千字 印数 3 001 - 6 000册

2001年3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2次印刷

定价:29.00元

目录

序	廖盖隆(1)
第一章 两年徘徊与改革开放的呼声	(4)
一 揭批“四人帮”,全国安定局面的出现.....	(4)
二 国民经济的初步恢复和“新跃进”的发动	(11)
三 “两个凡是”和实事求是的对立和斗争	(19)
四 真理标准大讨论与思想解放的勃起,真理 标准问题的提出	(35)
五 局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端	(46)
六 科教春天的来临和文艺复兴的开始	(51)
七 内外关系的调整和军队的整顿	(60)
八 民主与法制的恢复与重建	(75)
九 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出现,农村改革的呼唤.....	(79)
十 改革开放的酝酿与走向历史转折的前奏	(86)
第二章 历史转折与改革开放的兴起	(90)
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的历史转折	(90)
二 召开理论务虚会与重申四项基本原则.....	(131)
三 全面拨乱反正与调整、改革国民经济方针 的实施.....	(146)

四	十八户农民的契约与改革先在农村突破·····	(167)
五	城市改革的试点,搞活企业的尝试·····	(213)
六	打开国门,创办经济特区·····	(228)
七	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 ·····	(239)
八	对外关系的调整和“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	(252)
九	指导思想拨乱反正的完成和对建设社会主义 要点的探索·····	(261)
第三章	开创新局面与改革开放的发展 ·····	(270)
一	中共十二大与开创新局面纲领的制定·····	(270)
二	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完善和新宪法的通过·····	(289)
三	推进工业发展和改革与“首钢先进典型”的诞生 ·····	(294)
四	推进农业发展和改革与“苏南模式”的出现·····	(309)
五	开放 14 个沿海城市和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	(328)
六	提前完成“六五”计划主要指标与建设事业大发展 ·····	(336)

七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贯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 发展战略·····	(342)
八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突破·····	(354)
第四章	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与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	(361)
一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改革 的展开·····	(361)
二	农村第二步改革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412)
三	对外开放的扩展,由沿海向内地滚动格局的出现 ·····	(424)
四	对外开放给文化生活带来的深刻影响·····	(454)
五	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进展与面临的新问题·····	(468)
六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与两个基本点的提出·····	(475)
七	民主与法制建设的推进及其成效·····	(480)
八	对外关系的调整与军事体制的改革·····	(484)
九	政治体制改革的进展与全面改革方案的酝酿·····	(493)
十	中共十三大的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的形成·····	(497)

十一	改革和建设的显著成就与遇到的深层次矛盾	(506)
第五章	改革开放的波折与初步治理整顿	(512)
一	重大比例失衡与经济运行失序.....	(512)
二	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521)
三	治理整顿初见成效和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召开	(526)

序

廖盖隆

《改革开放的征程》是继《改革开放的历程》之后,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展示从 1976 年粉碎“四人帮”到 1989 年年初这 10 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征程的一部新著。该书的优点是克服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不完全按历史顺序写的不足之处,而是承前启后地沿着历史发展的阶段,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主线,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全面生动地再现新时期这一段波澜壮阔的人民共和国发展史。该书的内容新颖,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流畅,具有相当高的学术价值和相当大的可读性。

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史,是中国共产党 80 年历史上,特别是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50 多年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其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是一个对这以前延续了 21 年的“左”倾错误实行拨乱反正的时期,是一个真正集中力量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期,是一个对从苏联学来的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正确革命道路,系统地形成中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思想毛

泽东思想之后,又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始形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时期。

我们所处的新时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同各国人民在一起为维护世界和平和解决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有关人类共同利益问题而斗争的时代,是一个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为此而进行多方面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实行对外开放的时代。我认为,在和平、建设、改革、民主、开放这五大时代课题中,发展民主以推动改革和建设是中心课题。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我们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才能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群众的主人翁责任感和积极性、创造性,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发展民主不仅是政治领域的问题。它是渗透到和覆盖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民主,就是中国共产党过去赖以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成就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不过,过去的缺点是,我们的党内民主、人民民主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因此,在新时期,我们需要建立有完备的法制保障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坚决地、有步骤地革除封建主义的人治,坚决地、有步骤地建立真正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制。我们对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实行个人高度集权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全面改革的任务,就是要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新体制新机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历史任务。

我们所处的新时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前无古人的事业的时期。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不能

因此而自我陶醉,我们在前进的道路正在出现种种问题和困难,但不能因此而举步不前。目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正在跨世纪的征途上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奋勇前进。我们需要的是冷静和坚毅、信心和勇气。只要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精神文明的进程,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固有的优越性,我们就应当大胆地向前走,排除万难,去夺取新的胜利。

第一章

两年徘徊与改革开放的呼声

一 揭批“四人帮”，全国安定局面的出现

1976年10月6日，是个十分不寻常的日子。这一天，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在毛泽东逝世后，密谋篡党夺权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一伙实行了隔离审查，取得了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重大胜利。这一重大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激起一片欢腾。这一历史性胜利，在国外也产生重大影响，使世界人民看到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清除自己身上的毒瘤，领导人民走出“文化大革命”困境，开创历史发展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中国进入了由“文化大革命”动乱向着纠正“左”倾错误和开创改革、建设新局面转变的两年过渡期。在这两年过渡期，由于主客观的多种

原因,党和国家的工作呈现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粉碎“四人帮”初期,党和国家面临的国内形势十分错综复杂而严峻。首先,“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但他们的余党还在全国各地活动着,有一部分党组织和国家机构的权力还掌握在这些余党手里;“四人帮”经营多年的帮派体系还没有被摧毁,他们上下串连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制造事端,以致一部分地区的动乱尚未停止。其次,“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在许多方面需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再次,这时党内的思想相当混乱。由于“文化大革命”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的混乱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还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因此中国共产党内,特别在其领导层,对要不要纠正“文化大革命”及毛泽东晚年错误存在着重大分歧,对今后中国的走向也有着完全不同的抉择。

在这种困难和复杂的形势下,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清查其帮派体系,创造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冲破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指导思想和路线,扭转困难局面;在上述前提下,着力于实现走出“文革”困境,开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转变。

当时要从“文革”造成的困境中走出来,最紧迫的大事是,全国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斗争,实现全国安定团结,以便迅速开展各条战线的恢复和重建工作。为此,中共中央于1976年11月,作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的决定。中共中央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要有领导地分三个战役进行。第一个战役,着重揭批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清查其帮派体系;第二个战役,着重揭露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和丑恶历史,剥掉其披着的马克思主义外衣;第三个战役,着重揭批其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理论。适应这种部署,中共中央从1976年12月10日起,连续向全国发出了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随后揭批查的斗争就在全中国展开了。

1976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批发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以大量事实揭露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危害人民的罪行。配合《材料之一》的下达，《人民日报》于12月17日发表编辑部文章《灭亡前猖狂的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嘱咐”的大阴谋》。文章指出：“四人帮”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其目的就是利用这一伪造来推翻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夺取中共中央的最高权力。12月22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四人帮”的要害是篡党夺权》。社论说：“四人帮”全部反革命罪行的要害，就是“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建立法西斯的帮天下”。参照中共中央下发的“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第一批罪证材料，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结合“四人帮”及其帮派分子在本地区本部门作恶的事实，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第一战役的斗争，斗争迅速走向高潮。

人们口诛笔伐，揭批“四人帮”在政治上组织上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大搞分裂党的宗派活动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揭批“四人帮”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残酷迫害周恩来、朱德、贺龙、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各种罪行；揭批“四人帮”网罗党羽，组织反革命帮派体系，按照帮派标准突击发展党员，提拔亲信，重用坏人，妄图建立法西斯专政的反革命勾当。这些揭发批判，击中了“四人帮”篡党夺权、残害人民这个要害，提高了广大人民对于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性质和重要意义的认识。

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批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开始了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及其罪恶历史为中心的第二战役。配合《材料之二》的下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重要报刊刊载了《新老反革命

结成的黑帮》等众多批判文章,剥掉“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他们控制的宣传工具给其戴上的“‘文化大革命’的功臣”、“文艺革命的旗手”等桂冠,还其反革命的真面目。广大干部和群众结合《材料之二》,翻阅了大量历史资料,集中知情人提供的证据,向中央进一步揭发“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丑恶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张春桥、江青采取狡诈的手法,长期隐瞒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并利用“文化大革命”钻进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进行篡夺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危害。事实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扭转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他们表面上标榜自己“最革命”,利用革命领袖的错误煽动极左思潮,又利用革命领袖的威望鼓吹个人崇拜,以树领袖权威来树自己,把自己打扮成“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忠实接班人”,欺骗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实际上,他们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分子。经过第二战役的揭批斗争,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认识到“四人帮”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由他们的反动本性决定的。

在揭批斗争取得第二战役胜利成果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77年7月召开了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全会根据党章的规定和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对“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作出组织处理。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议》指出,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粉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和对他们采取的一系列果断措施,是完全正确的,全会一致表示同意。

《决议》指出,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是一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他们根本反对“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基本原则,进行分裂党、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就同林

彪一伙勾结在一起,进行破坏活动。党的十大以来,王、张、江、姚“四人帮”使用种种阴谋手法,猖狂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实现全面夺取党政军领导权、驾空毛主席的狂妄野心。他们利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四届人大,阴谋组织自己的“内阁”,妄图打倒周恩来。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疯狂打击和诬陷邓小平。他们对毛主席、党中央先后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极端仇视,疯狂反对,妄图打倒华国锋。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罪恶活动,阴谋推翻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使社会主义中国重新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国家。全会对“四人帮”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一致决定永远开除他们的党籍,撤销他们党内外一切职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这一决定,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人们拍手称快,进一步调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揭批“四人帮”的积极性。

1977年9月23日,中共中央又批发《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材料之三》揭露了“四人帮”颠倒敌我关系,炮制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还选择党的十大前后的重大事件,揭露“四人帮”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活动。然而,《材料之三》是有重大缺陷的。它名义上要求揭批“四人帮”的反动理论,但实际上对“四人帮”的反动思想、理论材料却很少触及。其原因是,当时主管中央宣传工作和专案组的汪东兴认为,“四人帮”有什么理论?王洪文是流氓,江青只会打棍子,张春桥、姚文元是书呆子,从而没能指出“四人帮”反动理论的一些重要观点,并给予批判。尽管如此,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党内老一辈革命家和理论家的带动下,仍然把揭批斗争同理论观点的正本清源相结合,对“四人帮”伪造、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谬论,诸如“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动论”、“老干部变成走资派论”、“老工人变成既得利益者论”、“知识

分子是臭老九论”、“全面专政论”、“黑线专政论”等大量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武器,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进行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正本清源的效果。通过第三战役的揭批斗争,在总体上剥掉了张春桥、姚文元等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画皮,还其反动谬论制造者的真面目,初步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了的一些理论是非,开始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

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特别注重从政治上组织上清查其帮派体系。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采取种种卑劣手段,上下左右网罗党羽,招降纳叛,培植亲信,拼成一个有纲领有组织的帮派体系。这个帮派体系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骨干力量,分布在全国各地区和中央一些部门,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一部分领导权。在王、张、江、姚“四人帮”被隔离审查以后,其帮派体系的骨干分子从事捣乱活动,制造谣言,攻击党中央对“四人帮”的隔离审查,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破坏社会安全的局面。为了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创造全国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必须把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认真做好。对此,中共中央明确指示:清查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充分发动群众查清楚。同时,运动越深入越要注意党的政策。要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我们所说的“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反革命帮派体系,是指“四人帮”和那些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在同“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当中,属于“四人帮”及其余党的帮派体系的,只是极少数。在清查工作中,一定要十分注意把受“四人帮”影响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同志,同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骨干分子严格区别开来。清查“四人帮”帮派体系的工作,由于深入发动了群众,又正确贯彻了政策,逐步排除阻力,广泛开展起来,历时两

年,取得了基本胜利。

到1978年年底,整个揭批查斗争取得了多方面的成绩,为实现全国范围的安定团结创造了条件。其成绩主要是:

首先,经过两年多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大大提高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这场斗争是关系到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认识,增强了识别乱党祸国的阴谋集团的能力,这就为统一全党全民的政治认识,清理历史问题,开创今后工作新局面创造了前提。

其次,两年的清查工作,基本上查清了同“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对证据确凿的“四人帮”余党和有严重罪行的帮派骨干分子,由公安部门逮捕归案;对于同“四人帮”虽然有牵连,做过错事,但没有参加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给予批评教育。这就纯洁了组织。在此基础上,整顿和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到1978年,在29个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中,查出同“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有牵连而被撤职的9人,占这些地区主要负责人总数的1/3左右。同时,还结合清查工作,对14个省、市、自治区和23个部、委、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的调整。相应地充实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抵制“四人帮”的破坏活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老干部进入领导班子。这对于稳定局势,拨乱反正,开展各项事业的恢复、重建,起了保证作用。

再次,两年多的揭批斗争,初步澄清了被“四人帮”搞乱的一些理论是非和政策是非,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观点,明辨重大是非的能力。同时,在斗争中涌现一批理论联系实际、善于思考、敢于发表创见的先进分子。这给后来的工作重点转移和实行改革开放,培养了骨干力量。

最后,随着揭批查斗争的胜利,中央逐步解决了河北保定地区的武斗问题,郑州、兰州铁路局的问题,以及云南、辽宁、甘肃、安徽等省的问题,促进了全国安定团结局面的实现。

两年多的揭批查斗争,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由于指导思想的